

国际乡村发展与减贫研究系列成果
INTERNA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RESEARCH SERIES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中国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汉英对照)

谭卫平 刘成斌
—— 著

中国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汉英对照)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谭卫平 刘成斌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中国精准扶贫政策与方略的可行性及其运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本研究结合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社会系统观等提出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耦合”理论，针对中国精准扶贫模式与减贫经验进行社会机制运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从精准扶贫的成效来看，中国精准扶贫方略不但消除了中国的绝对贫困，而且在国际上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典范，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减贫事业的一份精神财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汉英对照/谭卫平，刘成斌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10
ISBN 978-7-5680-7582-4

I. ① 中… II. ① 谭… ② 刘… III. ① 扶贫模式-研究-中国-汉、英 IV. ① F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01053 号

中国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汉英对照

谭卫平 刘成斌 著

Zhongguo Jingzhun Fupin Moshi Yanjiu: Hanying Duizhao

策划编辑：钱 坤 张馨芳

责任编辑：刘 凯

封面设计：孙雅丽

责任校对：张汇娟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美编室

印 刷：武汉科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75 插页：2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2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P R E F A C E

2020年，中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所有贫困县均顺利摘帽脱贫，国家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中国为世界减贫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这一贡献的基本动力和根本机制来源于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因经济水平、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多种扶贫阶段。精准扶贫政策是相对于历史上多种较为粗放的扶贫政策而提出的减贫战略。

从经验层面来看，精准扶贫根据贫困区域的环境、贫困人口的结构和属性，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开展扶贫工作，形成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准管理等策略体系，是系统化的减贫政策。精准扶贫思想从发端、形成、发展到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渐在国家顶层设计与实践形塑的相互循环中形成“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七个强化”的基本方略，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的减贫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也为未来城乡均衡发展、产业可持续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理论层面来看，减贫政策的运行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本研究结合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理论，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观与美国默顿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思想，提出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耦合”分析理论，主要是针对中国精准扶贫模式进行一般化表达的理论创新。就精准扶贫策略的设计与运行过程来看，减贫问题的复杂性就是多层次性和对象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减贫的结构演化、功能分化，以及作为工作对象的贫困人口的主观旨意进化等方面均存在系统的复杂性。因此，本研究从“耦合”的角度对精准扶贫的实施条件、运行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呈现中国减贫实践中两个及以上的多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减贫工作系统不断优化，政策成效不断提升的社会实践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者与运行主体、实施对象皆为这一政策的观察者，本研究应用“二阶观察”的视角解释“观察者”的观察所蕴含的价值支撑、文化支撑和发展理念等内在逻辑。由此本研究以“二阶观察”视角归纳出中国与中国的扶贫政策经历的以体制改革促进扶贫阶段的整体式扶贫阶段（1978—1986年）、区域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2年）、市场经济针对性反哺的项目制扶贫阶段（1993—2000年）、以村庄为基础的参与式扶贫阶段（2001—2012年），并最终优化为终结绝对贫

困的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年）。就“二阶观察”的视角而言，精准扶贫政策立足于内源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将贫困人口视为社会包袱，用共同体理念来统一，用共享经济观来实现内循环增长的结构基础，秉持积极贫困观去挖掘贫困地区的潜在发展能力，把欠发达地区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内源性发展为扶贫工作导向的共同体“造血”减贫。

从耦合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系统化的互动良性循环。既然减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多元的社会主体互动就是减贫获得成效的首要条件。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策略上形成了一个广泛参与的社会动员体系，形成从党中央、国务院到企业、社会舆论场等全方位参与的帮扶体系。专业的系统内考核与第三方监督等多元化督促机制促进政策的全面落实。这种动员全社会的精准扶贫在价值理念上不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也不以短期的利益为工作导向，而是力图通过补短板来维持社会平衡，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包容性发展社会理念是精准扶贫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这一理念将增长与发展的本质进行区分，强调公平正义，追求协调发展，重视制度创新，坚持系统思维，认为社会成员应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贫困群体的发展诉求理应得到关注与重视。这些价值支撑体现了中国制度在社会公平正义层面的优势底色。

从精准扶贫战略的成效评估来看，中国的减贫不但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在国际上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减贫的典范。首先，在精准识别减贫对象方面，精准扶贫成功实现靶向式目标耦合，改变了传统扶贫方式中“精英俘获”、扶贫错位的问题。其次，在建构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新体系方面，精准扶贫实现了政策对接的结构耦合，将精准扶贫方略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再次，精准扶贫方略在实施过程中与国家总体发展方略实现了运行过程耦合。最后，精准扶贫方略在助力大量贫困人口重新进入社会与市场发展的循环方面实现了功能耦合。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的精准扶贫已经落幕，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开启，精准扶贫形成的全社会动员式发展的精神力量与政策统一的文化认同正在乡村振兴的建设中发挥新的引领与整合功能。从精准识别到精准考核的实践经验也正逐步升级为预防和解决脱贫户返贫、边缘户致贫等问题的预警与监测机制。以共同体理念、全社会整合式发展观为指引的乡村振兴工作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共同富裕的中国梦蓝图将在中国每一个农村、每一位农民手里绘就。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上篇 中文部分

第一章 绪论	3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3
二、文献综述	4
三、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3
四、研究方法	16
五、操作路线	17
第二章 二阶观察与中国扶贫政策变迁	18
一、整体模式扶贫：以体制改革促进扶贫阶段（1978—1986年）	18
二、开发模式扶贫：区域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2年）	19
三、经济模式扶贫：市场经济针对性反哺的项目制扶贫阶段（1993—2000年）	20
四、行动模式扶贫：以村庄为基础的参与式扶贫阶段（2001—2012年）	21
五、社会扶贫模式：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年）	23
六、精准扶贫策略的特征分析	25
第三章 等值功能主义与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30
一、互动系统	31
二、组织力量系统	35
三、整体帮扶系统	38
四、社会监督与考核系统	40
第四章 系统理性与精准扶贫实践方略	45
一、精准识别子系统：追求公平正义	45

二、精准帮扶子系统：注重协调发展	48
三、精准管理子系统：重视制度创新	51
四、精准考核子系统：坚持系统思维	53
五、小结	56
第五章 全面耦合：中国精准扶贫模式分析	57
一、理论来源：结构与系统	57
二、理论界定：系统与耦合	58
三、理论结构：四重耦合	59
四、理论意义：社会整合与融合	66
第六章 系统理论与典型国家扶贫比较	68
一、印度的扶贫经验	69
二、巴西的扶贫经验	73
三、墨西哥的扶贫经验	78
四、典型国家扶贫经验比较	82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84
一、精准扶贫政策的社会成效	84
二、精准扶贫策略的社会创新性	89
三、精准扶贫与后扶贫时代的脱贫巩固问题	93
四、发展中国家扶贫工作建议与世界减贫的未来	96
参考文献	99

下篇 英文部分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109
I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109
II Literature Review	111
III Definitions and Theoretical Basis	125
IV Research Method	130
V Technology Route	131

Chapter Two: Second-order Observ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133
I Overall Mod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ystem Reform (1978-1986)	134
II Development Mode Poverty Allevi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1986-1992)	135
III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Economic Mode: Project-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age of Targeted Feedback from Market Economy (1993-2000)	
.....	137
IV Action Mod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based Participatory	
Poverty Alleviation stage (2001-2012)	139
V Social Mod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age (2013-2020)	141
VI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146
Chapter Three: Equivalent Functionalism and the System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155
I Interactive System	156
II System for Organizing Forces	164
III Integra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170
IV Social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174
Chapter Four: Systematic Rationality and Strateg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	182
I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Subsystem: Pursu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182
II The Subsystem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cusing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188
III The Subsystem of Accurate Managem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ystem Innovation	192
IV The Subsystem of Accurate Assessment: Adhering to Systematic	
Thinking	197
V Summary	201

Chapter Five: Comprehensive Coupling: Analysis of China' 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203
I Theoretical Source: Structure and System	203
II Theoretical Definitions: System and Coupling	205
III Theoretical Structure: Quadruple Coupling	206
IV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Unity	219
Chapter Six: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ystem Theor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Countries	221
I India' s Experi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222
II Brazil' s Experi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228
III Mexico' s Experi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235
IV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Countries	241
Chapter Seven: Summary and Prospect	244
I The Social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244
II The Social Innov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253
III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st-poverty Era	259
IV Poverty Alleviation Proposal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Future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World	263
Reference	268



上篇

中文部分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一直以来的历史任务。由于历史、自然地理条件等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落后，各种资源不足，交通不便，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产生了许多贫困地区。为解决贫困问题，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的相关政策，于 1986 年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扶贫办，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明确了贫困县划分的标准，并初步划定了 273 个国家级贫困县。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战略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精准扶贫的提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出发点，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全面系统推进脱贫攻坚，创造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指出，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 2012 年年底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2019 年年底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10.2% 下降至 0.6%。到 2020 年 2 月底，全国 832 个贫困县中已经有 601 个宣布摘帽，基本上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要求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到 2020 年我国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是我国扶贫工作历史上的里程碑。本研究将从理论、实践、政策等方面对精准扶贫进行归纳总结，讨论精准扶贫政策的演进、精准扶贫思想的内在逻辑，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之后扶贫工作是否还需继续以及如何进行的问题，从而形成中国经验，为其他国家脱贫提供借鉴。

（二）研究意义

1. 政策意义

政策是指国家、政党组织等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任务以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以权威的方式制定统一的、标准的行动准则。科学合理的政策是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对于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发展至关重要。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政策，该政策自提出并实施以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本研究聚焦于精准扶贫政策，全面分析该政策的优缺点，并立足客观实际，研究扶贫政策在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建议，对于新的历史阶段扶贫政策的改进与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2. 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基数大，并且经历了艰难的解放战争，生产力较为落后，导致中国的贫困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尤为严峻，中国的贫困人口占世界总贫困人口的40%，但在如此艰巨的情况下，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脱贫攻坚，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中国70多年的反贫困斗争不仅对本国而言举足轻重，而且具有重大的国际价值。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人类反贫困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提供中国方案。梳理我国精准扶贫的历史阶段以及取得的成果，总结我国在扶贫方面的不足和经验，继续探究未来的扶贫工作应该如何进行，对于我国和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理论意义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而目前关于精准扶贫的学术性成果仍然较少，多数是列举制度政策、梳理举措路径等方面。故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反贫困斗争实践，总结归纳我国精准扶贫的发展阶段、扶贫方式、政策特点等，探析精准扶贫政策的运行机制以及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从理论的高度、学理的层面探讨精准扶贫，以期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成果，完善世界减贫理论。

二、文献综述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力于解决的难题，更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也不容忽视。许多发达国家

虽然有着先进的生产力，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同样也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许多贫民窟。因此，反贫困斗争是全球范围内的斗争，反贫困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贫困概念的界定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学者们关注的侧重点也不同，学术界对于贫困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总体来说，对贫困的概念界定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维度。贫困首先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贫困是由于经济收入不足而无法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状态。但贫困还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关于贫困的内涵延伸到了社会—经济的角度，它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更具有综合特征，从这一综合角度来看，关于贫困的概念主要有以下界定。

1.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西方发达国家将贫困作此区分的由来已久，英国学者 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 首次提出“绝对贫困”的概念，他认为绝对贫困是指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最低的生理需求。^① 而英国学者 Peter Townsend 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对前述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缺乏社会上常见的各种饮食、设施以及社会活动，那么这个家庭就是贫困的。Townsend 对相对贫困的界定充分体现了贫困所具有的综合特征。^② 由于我国的贫困问题比较严峻，一开始的反贫困目标集中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上，国内学者对于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晚，且不深入。^{③④} 中国经过精准扶贫，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2020年后反贫困斗争的主战场是相对贫困，而且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国内学者对于相对贫困的界定有很多，比如，关信平认为相对贫困具有社会性，无论是从物质缺乏程度还是从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不足程度来看，贫困都是一个相对连续变量。^⑤ 除此之外，贫困还与自我认知和客观评价有关。

① ROWNTREE B S.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M]. Macmillan, 1902: 103.

② MCLACHLAN H V. Townsend and the concept of “poverty” [J].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983, 17 (02): 97-105.

③ 王祖祥，范传强，何耀．中国农村贫困评估研究 [J]．管理世界，2006 (03): 71-77.

④ 秦建军，戎爱萍．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J]．经济问题，2012 (11): 95-98.

⑤ 关信平．论现阶段我国贫困的复杂性及反贫困行动的长期性 [J]．社会科学辑刊，2018 (01): 15-22, 209.

2. 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的概念源自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他认为可行能力是一个人可获取各种社会性活动的选择机会，能力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因此，贫困不单单是经济上被剥夺，更是生活中所需的可行能力被剥夺。^①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要求“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能力扶贫的研究，主要有教育扶贫^②、旅游扶贫^{③④}、互联网+扶贫等^⑤，主要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

（二）关于贫困测量标准与贫困识别的研究

要推进扶贫工作，首先要明确哪些人属于贫困人口，要有测量的标准。贫困测量和贫困识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1. 贫困测量标准

（1）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贫困测量标准。

① 标准预算法。也称“市场菜篮子法”，是从绝对贫困的角度出发的。首先要求确定一揽子基本消费品，包括社会公认的最起码的生活水准和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然后根据市场价格来计算拥有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的现金量，该金额就是贫困线，也是最低生活保障线。

② 国际贫困标准。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50%。该标准从社会救助的角度出发，简单明了且容易操作。

③ 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也是常用的标准，是指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超过60%时就属于贫困人口。该系数可以用来测量家庭、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贫困程度。

（2）中国的贫困标准。

中国采用的贫困标准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国家

①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 [M]. 任贇,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3.

② 赵建勇. 精准扶贫视域下大学生农村教育扶贫问题研究 [J].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 22 (06): 54-55.

③ 陈梓楠. 基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 [J]. 农业经济, 2018 (09): 58-59.

④ 陈可伊, 杨绍李, 杜天豪, 等. 精准扶贫背景下乡村旅游模式及其精准扶贫绩效分析——基于宜昌市长阳县的调研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7 (11): 25-29.

⑤ 王琦.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电商发展新思路 [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0, 41 (21): 227.

实际发展水平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贫困标准也越来越高。我国到目前为止一共采用过三种不同的贫困标准：1978年标准、2000年标准以及2010年标准。目前我国的贫困线以2011年确定的2010年标准（2300元）为基线，根据每年的情况会有不同幅度的上涨，此标准相较于之前大幅上涨，接近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效。我国实行2010年标准以来，历年贫困标准如表1-1所示。

表 1-1 我国实行 2010 年标准以来历年贫困标准（单位：元/年）

年份	贫困标准
2010	2300
2011	2536
2012	2625
2013	2736
2014	2800
2015	2968
2016	3146
2017	3335
2018	3535
2019	3747
2020	4000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公开数据资料整理所得。

2. 贫困识别研究

过去的扶贫政策中似乎没有明确体现贫困识别的问题，而贫困识别恰恰是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步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则完善了这一步骤。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可以理解为对症下药，谁贫困帮扶谁。精准扶贫与粗放扶贫相反，重在精准，其中就包括精准识别，即扶持对象要精准。国内学术界对于贫困识别的研究还较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贫困识别的方法。蒲艳等从生物学方法、权利分析法、可行能力维度和多维度指数等方面分析贫困识别的方法，指出由于中国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对于贫困的识别应该从保障人口生活所需要的最低经济收入水平，扩展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状况上来，努力减少相对贫困和能力贫困，防止脱贫人口返贫。^①

^① 蒲艳，冯开国．贫困识别与贫困测度方法的比较与启示 [J]．中国物价，2020（11）：38-40．

二是贫困识别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候敏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精准识别的现状以及普遍化程序,指出在流程化背后可能会出现数字脱贫而不是人口脱贫、精英识贫导致扶富而不是扶贫、农民难以参与其中等问题,进而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措施。^①

(三) 关于贫困原因的分析

我国学术界、思想界非常重视致贫原因分析,因为找到贫困产生的原因就可以针对性地实施具体措施来消除贫困,所以对于贫困产生原因的学术研究较多。由于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地域不平衡的特点,产生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大多数学者都是结合某一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笔者将复杂多样的致贫原因分为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1. 客观原因

(1) 制度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产生贫困,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必然使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大多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存在致贫的制度因素。^② 曾志红等人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现象,农村和城市发展存在二元对立,农村各种社会制度不完善是造成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由此可见,社会不平等是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贫困,必须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2) 自然因素。牙韩高以百色为研究对象,指出其贫困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百色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全国18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地理位置十分偏僻,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受地形影响不适宜农业发展,水土流失严重且生态脆弱,旱涝自然灾害频发,使得当地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④ 自然地理条件恶劣,生产资源不足,这也是大部分西部贫困地区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

(3) 政策因素。贫困是社会问题,贫困人口自己脱贫较为困难,需要其他主体进行干预,主要是国家政策干预,政策实施主要依靠各级政府,但在实施中会存在各种问题使得政策实施不合理。杨龙等人指出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某些扶贫机构出现冗员现象,无故增加支出,使得扶贫资金并不能全部用于扶贫项目上;扶贫政

^① 候敏. 精准扶贫中贫困识别问题研究 [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0 (21): 171-173.

^②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六卷) 第三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541.

^③ 曾志红, 曾福生. 我国农村致贫的社会制度因素分析 [J]. 农业经济, 2013 (11): 33-35.

^④ 牙韩高. 百色市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分析及对策 [J]. 传承, 2020 (03): 73-78.